

高翔 著

论物价改革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论 物 价 改 革

高 翔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论 物 价 改 革

高 翔 著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秦皇岛市第二印刷厂排版
太 阳 宫 印 刷 厂 印 刷

787×1092 毫米 32开本 7.5印张 167千字

1982年4月第1版 198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4,000 册

统一书号: 4190·115 定价: 0.71元

出版说明

物价问题涉及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对人民生活有着重大的影响；物价政策是党和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建国以来，我们的物价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也存在不少问题，诸如否认价值规律对生产的调节作用；不少商品的价格严重背离价值；物价管理过分集中，等等，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改革物价十分必要。

当前我国正在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 and 改革。经济调整和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价格问题。物价改革的进程，必须和国民经济的体制改革相适应。因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是要求按经济规律办事，不合理的价格不调整，经济调整就不能顺利进行；经济改革的主要措施也就无法得到落实。

为了适应广大经济理论工作者和物价工作者的需要，我们出版了高翔同志的《论物价改革》一书。作者长期从事经济工作。在实际工作中，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书中结合我国当前经济调整 and 改革的具体情况，论述了物价改革的重要性；对如何改革物价，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设想，值得广大读者重视，并可供经济工作者，特别是从事物价工作的同志、企业管理人员、商业人员，以及关心物价问题的同志学习参考。

目 录

一、搞好经济调整，为经济体制全面改革创造良好的条件·····	1
二、在国家计划指导下自觉利用价值规律·····	26
三、扩大企业自主权·····	57
四、把价格形成建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	82
五、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及其解决的途径·····	102
六、坚持按质论价的原则·····	122
七、提倡产销见面，减少中转环节·····	130
八、议购议销是自觉利用价值规律的重要形式·····	139
九、稳定物价是党的物价工作的基本方针·····	149
十、物价体系的全面改革·····	160
十一、建立起一套以经济办法为主，同必要的 国家行政干预相结合的经济管理体系·····	202

一、搞好经济调整，为经济体制 全面改革创造良好的条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指引下，我们在调整国民经济的同时，对经济体制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改革。两年来的实践证明，经济调整和经济改革试点工作已经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果。但是由于粉碎“四人帮”后头两年，我们没有足够估计十年破坏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也没有清理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因而前一段对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重视不够，给经济体制改革带来一些困难和问题。所以为了解决我们经济面临的困境，彻底扭转经济工作的被动局面，还需要对我们的经济进行进一步的调整，才能为经济体制改革和物价改革创造更良好的条件。

我国生产、建设和流通中的经济效果差，是同现行经济体制的弊病分不开的。从根本上讲，必须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才有出路。对现行体制如果不加以改革，我们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提高经济效果。而经济体制改革的前提条件是调整。只有经过调整，生产发展了，城乡人民生活提高了，市场供应基本正常了，国民经济的不合理结构改善了，才能放手进行体制改革和物价改革，也才能从根本上解

决我国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我们当前的任务，就是通过调整
和改革，为我国经济建设走出一条新路子。

（一）三中全会以来经济调整 and 改革试点工作的成就

经济体制改革和物价改革，必须有相应的条件。在生产
紊乱、市场物资供应紧张的情况下是无法进行的。经过两年
来的调整工作，从目前我国经济形势看，改革的条件已开始
具备，改革的任务，也将日益繁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把四化建
设、经济工作作为全党工作的中心；从 1979 年开始，实行调
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在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新的
政策，开始进行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试点，在实行计划经济
的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经济调整 and 改革，试点的
措施已初见成效，整个经济活起来了。

粉碎“四人帮”以来，经过政治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
正，经济上的艰苦恢复工作；党的经济政策的落实和深入人
心，经济形势迅速好转超过了预料的程度。整个工农业生产
经过初步调整，发展速度加快了。1979 年国民收入比上一
年增长 7%。农业总产值比上一年增长 8.6%；1978 年、1979
年，两年共增产粮食四千九百多万吨；两年连续这样大幅度地
增长，是建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1980 年由于自然灾害严重，
粮食减产一千多万吨，但仍高于 1978 年，为建国以来仅次于
1979 年的第二个粮食高产年。1980 年油料产量达到七百六
十九万吨，比上一年增产 19.5%；肉类产量一千二百零五万五
千吨，在上一年增加二百零六万吨的基础上又增加 13.5%；
1980 年棉花产量创建国以来的最高纪录，总产量达二百七
十万零七千吨，比上年增产五十多万吨，增产达 22.7%；

其他经济作物，如红黄麻、蚕茧、茶叶、甘蔗、甜菜等，都有不同程度地增长，多种经营和社员家庭副业有较快的发展。改变了多年来农业生产发展缓慢的状况。工业生产也有了新的发展，1979年工业总产值比上一年增长8.5%，而1980年比79年又增加8.7%，其中：轻工业产值1979年比1978年增长9.6%，而1980年又比1979年增长18.4%；重工业产值1979年比上一年增长7.7%，1980年增长1.4%。由于采取了在原料、燃料和动力供应等方面优先保证轻工业生产的措施，使轻工业增长速度连续超过了重工业的增长速度。工业产品质量有所提高，花色品种增加，各地轻工业，1980年试制成功新产品七千种，新花色十万种。市场活跃，商品购销两旺。1980年全民所有制商业部门商品收购总额达二千二百六十三亿元，在1979年已增长14.5%的基础上，又增长13.6%；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二千一百四十亿元，在上一年增长14.7%的基础上，又增长18.9%，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仍增加12.2%；各类消费品的零售量全面增加，特别是耐用消费品增加更快；商品库存量增加，市场供应状况迅速好转。1979年生猪收购量达到一亿三千万头，比上一年增加两千多万头；长期供不应求的猪肉已在全国敞开供应。现在肉、蛋、烟、酒、糖等主要副食品的市场供应，都有明显好转；轻工业产品，如针棉织品、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手表、电视机、录音机等销售量，也有较多增加；集市贸易价格下降，反映供应关系状况有了改善。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把林彪、“四人帮”十年破坏、并且以前已存在的混乱的经济，调整和恢复到现在这种程度，这本身就是重大的胜利。实践证明，党和政府所采取的经济调整 and 改革试点措施及其相应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这些伟大成绩绝不是轻易得来的。而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做了大量的、艰苦的恢复和调整工作的结果。

首先，在政治思想路线和经济政策的拨乱反正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正确措施。前两年逐步摆正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把人们从“四人帮”的思想枷锁中解放出来，人们敢于抓生产、抓业务了。三中全会开始了党的工作着重点的转移，走上了以经济工作为中心的轨道，制定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使人们思想得到了进一步解放；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成为经济建设工作的指导思想。在工农业生产中，落实了按劳分配的原则。中央制定和颁发了两个农业文件之后，各级党委狠抓了农业，农村在放宽政策、发挥优势方面，开辟了许多新的路子，发展了多种经营和家庭副业，开放了集市贸易等；工业经过整顿和调整，实行了企业利润留成和奖金制度，初步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大家动脑筋、想办法把企业搞活，把生产搞上去。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展销、自销、代销等活动，因而促进了工商结合，产需衔接，使适销对路的商品逐步增加，并开始努力讲求经济效益。总之，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对经济状况迅速恢复和好转，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其次，改善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由于林彪、“四人帮”的长期干扰破坏，带来了国民经济严重的比例失调，这种状况，经过几年来的努力，特别是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后有了很大的改善。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已朝着协调的方向发展。在农、轻、重关系上，农业生产长期落后的局面开始有了转变；轻工业增长速度超过了

重工业；轻工业比重已由1978年的42.7%到1979年上升为43.1%；1980年又上升到46.9%；重工业经过调整产品结构，在为农业、轻工业和人民生活服务等方面有了进步；国家预算内的基本建设投资开始缩短，过高的积累率开始降低，积累率已由1978年的36.5%，1979年降为33.6%，1980年预计可降到30%左右；搞了一些填平补齐、城市建设、住宅建设、文教卫生、商业服务建设等工作，还了一些欠帐，“骨头”和“肉”的关系已有所改善。

第三，开始了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试点工作，进一步搞活了经济。三中全会以来，强调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重视了经济规律的作用，因而推动了经济调整 and 改革。其主要作法是：尊重和保障农村社队的自主权。全面推行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搞了国家工商企业自主权试点；在国家计划指导下，部分地发挥了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采取鼓励企业在社会主义所允许的条件下展开竞争的方法，实行择优和联合；扶植城镇集体经济的发展，允许合法的城乡个体经济的存在和一定限度的发展，等等。开始改变了生产、流通、分配等方面过分集中的状况，使整个国民经济比过去活了，特别是在企业自主权试点和实行中央、地方两级财政体制以后，不仅为经济形势迅速好转提供了重要条件，而且还为寻求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进一步制定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设想和长远规划积累了一些实践经验。

第四，党和政府大幅度地改善了城乡人民生活水平。在国家财政相当困难的条件下，为清偿“四人帮”干扰破坏所带来的长期欠帐，1979年国家拿出了八十二亿元用来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拿出了二十亿元用于减免一部分农村税收，1980年农产品实行议价和超购加价，国家又拿出八十六亿

元。从 1978 年到 1980 年三年来，由于农业生产的增长和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农民增加收入二百五十八亿元；1979 年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安排了城镇待业人员和大中专应届毕业生，在 1979 年已安排九百零三万人的基础上，1980 年又安排就业人员九百万人；提高了 40% 职工的工资级别、部分地区的工资类别，实行了奖金制及副食品价格补贴等。据国家统计局对二十三个省、市、自治区一万零二十八个农民的家庭调查，1979 年平均每人纯收入一百六十元二角，比 1978 年增加二十二元六角，1980 年又有新的增加。全国农民平均每人收入，1977 年为一百一十七元，到 1980 年已上升到一百七十元，三年增长 45%，比 1956—1976 年二十年间增加的总和还多十三元。职工年平均工资从 1977 年六百零二元，到 1980 年上升到七百六十二元，三年增长 26.5%；此外，1980 年工人还获得了相当于两个月工资的奖金，机关职工也得到相当于一个月的奖金。同时，1979 年兴建了职工住宅面积六千多万平方米，1980 年预计竣工面积达七千八百万米，这两年都是建国以来最多的。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开始纠正了“左”的错误。二十多年来，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在生产关系方面不顾生产力发展水平，急于过渡；在经济建设方面，急于求成，盲目追求高速度；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特别是“四人帮”的十年破坏，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粉碎“四人帮”后，我们没有及时纠正“左”的错误，1978 年又来一个“大干快上”，基本建设拨款这一年增加了 40%，大规模引进国外设备，使已经严重失调的经济比例更加严重了。这是一个重要教训。我们在六十年代，三年经济调整很成功，但由于没有经验，矛盾也没有暴露到这么尖锐，当时

没有清理“左”的错误，因而招致了后来“左”的错误的继续发展，直至粉碎“四人帮”后，又重复了这一严重错误。所以认真总结历史经验，纠正“左”的错误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粉碎“四人帮”以来最大的变化，还是人们精神面貌的变化。现在广大农村，面貌一新，人心舒畅。城乡人民，各行各业，都在总结过去的经验，探索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途径。

由于经济形势的迅速好转，生产和人民的经济生活得到了恢复和提高，这就为考虑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和总体改革，提供了可能和条件。

经济体制改革和物价改革，必须有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比如说需要有一个大体的市场均势才能顺利进行。因为进行改革的指导思想，是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如果市场上的物资和商品供应全面紧张，进行市场调节就会有很大困难，市场机制也无法发挥正常作用。因为当整个经济绷得很紧时，卖者在市场上占上风，形成买者抢购物资和商品，“走后门”之风盛行。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经济效益就不能准确反映出来，真正的竞争也就开展不起来，因此也无法择优和联合。这样一来也就不能全面地推行改革。所以对经济改革问题应持慎重态度，要在进一步调整的基础上才能全面展开。目前还要继续搞好调整，不能在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没有得到适当调整之前，就急急忙忙地进行重大的全盘的体制改革。否则不仅由于缺乏必要的条件而难以进行，而且搞得不好，还可能引起新的混乱。

由于长期以来在工业生产上追求高指标，基本建设摊子

铺得太大，挤了广大人民的生活消费，造成积累和消费关系的严重失调。三中全会后，两年以来，一方面，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针对比例失调的现实情况，采取了一系列调整经济的措施，取得了很大成绩，争得了如上所述的大好经济形势，为经济改革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又由于粉碎“四人帮”后的头两年，没有足够估量“文化大革命”十年破坏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也没有来得及清理经济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因而造成这两年执行三中全会经济调整的方针不够得力，对前两年超过实际可能的指标和要求，纠正的也不够及时。因而造成连续两年财政大量赤字，货币发行过多，引起物价上涨，给国民经济发展造成困难。为消除潜在的危险，中央和国务院决定，从1981年起对整个国民经济作进一步的调整，以便取得全局的稳定和主动。只有经过进一步的经济调整，创造更坚实的基础，才能放手搞经济体制改革和物价改革，才能使整个经济转上健全发展的轨道。

（二）进一步调整经济的必要性

为什么说当前我国经济在大好的形势下，而又潜伏着危险呢？原因是多方面的。问题的成因由来已久。解放前我国是一个半殖民地经济结构，不仅落后，而又畸形发展；建国后长期以来，我们在经济建设中又总是急于求成。所以我国经济一直存在着严重的比例失调问题。加上“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破坏，以及在粉碎“四人帮”后的头两年，又来一个“大干快上”，把已经超过国力的基本建设规模更加扩大了，由于没有经验，进口成套设备规模也扩大了，超过了实际的需要与可能，这种新的冒进错误，加剧了比例关系的失

调。到三中全会前后，就已发展成为财政、信贷、外汇收支不平衡的局面。可以看出，如果没有1977和1978年两年的新的冒进错误的话，目前经济的进一步调整措施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我们在人民生活方面也“欠帐”太多。二十多年来，一直是挤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消费，来维持高积累、高基建规模和生产上的高指标。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就得还这一笔“欠帐”。为改善人民生活的最必需要求，我们在1979和1980年两年，大幅度的提高了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安排劳动就业，增加职工工资，实行奖励制度。这些都是十分必要的，对于调动城乡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问题就在于，用于改善人民生活的消费性支出大幅度增加，而基本建设规模和其它支出未能相应地按计划压缩下来。这就造成近年来，用于积累和消费基金的合计超过了总国民收入的增长，国家安排的基本建设和各项开支的总和，超过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因此，近两年的财政连续出现赤字，货币流通量有相当大的增加，物价上涨，为经济发展造成潜伏的危险。

原来三中全会决定调整经济时，计划压缩基本建设九十多亿元，用以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和增加职工工资的一百亿元。执行结果，由于种种原因，基本建设计划没有压缩下来。1978年全国基本建设总额是四百八十亿元。1979年没有缩小，反而增加到五百亿元，1980年虽然在国家预算内基建指标减了一些，但由于实行企业利润留成，企业有了钱，自筹基建大为增加，全部基本建设规模又达五百三十九亿元，总额并没有缩小。同时增加职工工资、奖金和提高农产品收购价

格，都突破了原定的计划。1979年增加工资和提价达到一百六十一亿元，超过计划六十多亿元；1980年农产品正式提价虽然不多，而议价和加价，又达八十六亿元，工资和奖金也有所增长。这样一来，就造成超计划一百多亿元。最终结果都表现在财政赤字和增发票子上。1979年国家财政已有赤字一百七十亿元，1980年原定赤字八十亿元，结果达一百二十七亿元，银行原计划增发三十亿元票子，实际增发了七十六亿元。另一方面是，这几年来，社会购买力大幅度增加。过去二十年，平均每年社会购买力增加五十亿元左右，1970年到1977年每年增加八十四亿元，1978年增加一百四十八亿元，1979年增加三百二十二亿元，据国家统计局测算，1980年大约比1979年又将增加二百亿元以上，是建国以来增加最多的一年。这样就给市场供应造成很大压力。由于市场货币流通量增多，商品供应量未能相应增长，1980年平均零售价格同上年比较，上涨了6%，其中副食品上涨13.8%，财政收支，信贷收支和商品供应的不平衡，就带来了在经济形势很好的条件下，而又出现稳定市场物价的严重困难。

财政、物价方面出现的这些问题，反映出我们前一段经济调整工作还没有做好。虽然形势很好，但从整体、从宏观角度看，我们经济工作的被动局面，还没有完全扭转过来，如果我们不采取坚决措施对经济实行进一步调整，就会继续出现财政赤字，增发货币，其结果是物价还将上涨。这样发展下去，广大农民群众这几年在经济上得到的好处、职工增加的工资和奖金，都会被抵销，从而产生多方面的严重后果。所以中央和国务院根据我国当前的经济状况和以往的经验教训，下决心进一步搞经济调整。决定1981年要把调整作为经济工作的中心，调整的幅度要比前两年更大，调整时间

要延续几年。这是中央在对当前经济形势作了全面估量的基础上做出的有深远意义的重大决策。

当前调整经济的主要措施，是在宏观经济方面加强计划管理，进一步压缩基本建设，特别是制止地方和企业的盲目建设，解决以小挤大，以新挤旧的重复浪费现象；压缩行政开支，控制人民购买力的过多增长；并采取措施，克服我们经济工作中的严重浪费，提高经济效益；争取尽快地实现财政收支平衡，信贷收支平衡，并把市场物价基本上稳定下来。为什么在经过将近两年时间的调整工作以后，中央对经济调整又下了这样大的决心？姚依林同志说：“下这样的决心，是党和政府对人民利益负责的表现，也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许多资本主义国家，财政赤字庞大得惊人，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成为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在我们国家里，依靠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一般可以做到不出现财政赤字；而在出现赤字以后，依靠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依靠党、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团结一致的努力，通过切实有效的调整措施，完全能够实现财政、信贷平衡，消除经济中潜伏着的危险。”^①

可以看出，我们这次调整，正象陈云同志说的那样，是“健康的、清醒的调整。”这次调整和六十年代初期那一次经济调整相比有很大不同。在1961年调整前夕，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市场商品奇缺，集市价格暴涨，许多人吃不饱饭；而我们现在的经济情况是，生产稳步上升，人民生活已得到相当明显的改善。那时是一年比一年紧张，现在是一年比一年好。再一个很重要的不同点，是1961年的调整，没有

^① 姚依林：《关于调整一九八一年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财政收支的报告》，见《人民日报》1981年3月8日第3版。

“正本清源”，没有对经济工作上“左”的错误进行揭露和纠正，因而在经济好转后，那一套“左”的东西就又出笼了；现在这次调整是从根本上正本清源，批判了“左”的指导思想。总结了经验教训，因而是清醒的，健康的。所以这次调整，是三中全会以来各项正确方针、政策的继续和发展，是三中全会实事求是、纠正“左”的错误的指导思想的进一步贯彻和落实。

（三）当前经济调整的主要内容

当前进一步调整经济的首要目的，是要达到三条要求：第一是努力做到财政收支平衡，消灭赤字；第二是实现信贷收支平衡，不再搞财政性的货币发行；第三是控制物价，整顿议价，把物价基本稳定下来，特别是把占人民生活消费支出70%左右的基本生活必需品的销售价格稳住。这三点要力争尽快地实现。

实现这三条要求，就必须进一步压缩基本建设投资，坚决把不具备建设条件和建成后不具备生产条件的建设项目停下来；把同现有企业争原料、争燃料、动力的重复建设项目停下来；压缩各项行政开支和事、企业管理费。就是说，在这些方面必须坚决地退，而且要退够。我们前两年的调整工作之所以进行得不够全面、不够得力，主要地就是由于在这些方面该退的没有退，或者没有退够。现在我们应该把这些方面的调整内容补上去。

调整是个积极的方针。我们讲以上方面要“退够”，是为了把不切实际的过高的经济增长指标退到国家现实的财力、物力所允许的水平，并不是停滞，更不是倒退。暂时的局部的退，是为了创造条件，让一些短线产品和急需部门更